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共情双成分结构、社会功能及神经机制综述

邓怡逸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6年6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4日

摘要

共情是个体理解并回应他人内部状态的重要心理能力，在社会互动、亲社会行为和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既有研究对共情的定义和操作化并不一致，常将情绪共享、观点采择、共情关怀和个人痛苦等不同过程混合使用，导致共情的社会后果呈现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以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为核心线索，梳理共情双成分结构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并进一步比较二者在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上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共情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的情绪线索的敏感性、情绪卷入和即时反应，其神经基础更多涉及情绪共享、内感受加工和身体状态表征；观点采择则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的信念、意图、情绪原因和处境的理解，其神经基础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自我区分和前额叶-颞顶网络。二者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在真实社会互动中动态协同，并受到自我区分、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等因素调节。区分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有助于澄清共情研究中的概念混用，并解释共情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为何产生不同社会后果。

关键词

共情，情感共情，观点采择，认知共情

Affective Empathy and Perspective-Taking: A Review of the Two-Component Structure, Social Functions,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Empathy

Yiyi De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3,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Empath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capacity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others' internal states, playing a key role in social interacti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moral judgment.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used inconsistent definitions and operationalizations of empathy, often conflating emotional sharing, perspective-taking,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onal distress. This has led to inconsistent, and sometimes even contradictory, findings regarding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pathy. Focusing on affective empathy and perspective-taking as two core component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two-component structure of empathy and further compares their differences in social functions and neural mechanisms.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ffective empath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ensitivity to others' emotional cues, emotional engagement, and immediate responses, with neural mechanism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sharing, interoceptive processing, and bodily state representation. In contrast, perspective-taki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beliefs, intentions, emotional causes, and situations, with neural mechanism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ental-state inference, self-other distinction, and the prefrontal-temporoparietal network. The two components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yet dynamically coordinated in real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are modulated by self-other distinc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Distinguishing affective empathy from perspective-taking helps clarify conceptual ambiguities in empathy research and explains why empathy may lead to different social consequences across contexts.

Keywords

Empathy, Affective Empathy, Perspective-Taking, Cognitive Empath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共情是个体理解并回应他人内部状态的重要心理能力，也是社会互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在日常交往中，个体不仅需要觉察他人的情绪变化，也需要理解其行为背后的信念、意图和处境，并据此调整自身反应。无论是在亲密关系中的情绪支持，还是在医疗、教育、司法等需要理解他人处境的实践情境中，共情都被视为维持社会联结、促进亲社会行为和支持道德判断的重要机制(Decety & Jackson, 2006; Bernhardt & Singer, 2012)。

然而，既有研究对共情作用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共情常被认为能够促进助人行为、合作倾向和公平关切；另一方面，过强或缺乏调节的共情反应也可能导致个人痛苦、情绪耗竭、判断偏差甚至回避行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共情并不是单一心理过程。不同研究所谓的“共情”可能分别指向情绪共享、观点采择、共情关怀或个人痛苦等不同成分；如果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一概念，就容易导致研究结果之间难以比较，甚至出现看似矛盾的结论(Davis, 1983; Cuff et al., 2016)。

在共情的多成分结构中，情感共情和观点采择是理解上述差异的两个关键成分。情感共情强调个体在感知或想象他人情绪状态时产生相应的情绪卷入，即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他人的情绪；观点采择则强调个体从他人立场出发理解其信念、意图、情绪原因和社会处境，即个体能够“理解到”他人的心理状态。二者在真实社会互动中经常共同发生，但并不具有相同的加工方式和社会功能。情感共情

能够提高个体对他人痛苦和情绪线索的敏感性,却也可能在缺乏调节时转化为个人痛苦;观点采择能够帮助个体理解他人的处境和需要,却并不必然产生情绪关怀或亲社会动机。

因此,本文并非仅仅旨在论证共情具有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两个成分,而是以这两个成分为核心线索,进一步比较它们在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上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共情更多涉及情绪共享、内感受加工和身体状态表征,观点采择则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自他区分和前额叶-颞顶网络(Shamay-Tsoory et al., 2009; Schurz et al., 2021)。从这一角度看,对二者进行区分和比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共情在不同情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社会后果。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共情概念的分歧及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其次比较二者在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上的差异;随后结合相关争议与备择模型,进一步说明双成分框架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最后讨论二者的动态关系、调节机制以及在临床、教育和司法等领域的应用启示。通过这一综述,本文旨在说明,共情不应被理解为单一能力的强弱,而应被视为由情绪共享、心理状态理解和调节机制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区分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不仅有助于澄清共情研究中的概念混用,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共情在复杂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机制。

2. 共情的概念与双成分结构

2.1. 共情概念的来源与定义分歧

“共情”(empathy)一词通常被认为源于德语“Einfühlung”,最初用于描述个体将自身感受投射到艺术作品或外部对象中的“感入”过程,后由 Titchener (1909) 引入英语心理学语境。随着研究对象由审美体验转向人际互动,共情逐渐被用于描述个体感知、理解并回应他人内部状态的能力。由于共情同时涉及情绪体验、认知推断、自他关系和行为动机等多个层面,不同研究传统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共情研究中最基本的分歧来自情感取向与认知取向的不同侧重。前者强调个体面对他人情绪或处境时产生的替代性情绪反应,即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后者则强调个体暂时摆脱自身立场,理解他人的观点、信念、意图和感受,即是否能够“理解到”他人的心理状态。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 (2004)指出,情感路径和认知路径构成共情研究中的两种重要取向,但在现实互动中,情绪反应与心理理解往往同时出现,二者并不容易被完全拆分。

这种分歧不仅是术语差异,也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解释。Cuff 等(2016)回顾多种共情定义后指出,不同定义在共情的认知与情感属性、自他区分、特质与状态属性、自动与控制加工以及是否包含行为结果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共情并不是一个单一能力,而更接近由多种相互联系但并不等同的心理过程构成的综合性构念。若不区分这些过程,“高共情”既可能被解释为更强的助人倾向,也可能被解释为更高的个人痛苦或情绪耗竭。

Davis (1983)提出的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较早体现了共情的多维结构观。IRI 将共情相关反应区分为观点采择、幻想、共情关怀和个人痛苦等维度,说明个体面对他人处境时可能产生不同性质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成分化理解。Decety 和 Jackson (2006)指出,共情不仅包括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共享,还需要观点采择、自他区分和情绪调节;Bernhardt 和 Singer (2012)也强调,共情区别于情绪感染之处在于,观察者在受到他人情绪影响的同时,仍需知道该情绪来源于他人。由此,本文不将共情视为单一能力或人格特质,而将其理解为由多个心理过程组成的构念,并聚焦其中两个核心成分: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

2.2.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概念区分

情感共情通常指个体在感知或想象他人情绪状态时,产生与他人状态相似或相应的情绪反应。它强

调情绪层面的共享或共鸣,即观察者在看到他人痛苦、恐惧、悲伤或快乐时,自身也会被唤起相应的情绪和身体反应。**Preston 和 de Waal (2002)**的知觉-行动模型认为,感知他人的情绪或身体状态会激活观察者自身相关表征,从而产生情绪感染、情绪共鸣或趋近/回避反应。疼痛共情研究也表明,观察他人疼痛与亲身经历疼痛在部分情绪-动机加工区域存在重叠,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完整复制了他人的感觉经验(**Singer et al., 2004**)。

在研究中,情感共情常通过疼痛共情任务、情绪面孔加工任务、情绪感染指标、情绪唤醒报告或 IRI 中与情感反应相关的维度加以操作化。这些方法共同关注个体在面对他人情绪或身体状态时是否产生情绪性、身体性或注意层面的卷入。需要注意的是,情感共情并不等同于个人痛苦。前者指向他人情绪状态的共享,后者则更多表现为观察者自身的焦虑和不适;当情感共情过强且缺乏调节时,才可能转化为自我导向的个人痛苦(**Batson et al., 1997; Decety & Jackson, 2006**)。

观点采择则更强调个体从他人立场出发理解其心理状态的能力。它通常被视为认知共情的重要形式,涉及对他人信念、意图、愿望、知识状态、情绪原因和情境处境的推断。**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 (2004)**认为,认知取向的共情需要个体暂时搁置自身视角,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并据此预测其行为。**Davis (1983)**的 IRI 量表也将 Perspective Taking 作为独立维度,用以衡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自发采纳他人心理视角的倾向。

观点采择与心理理论或心智化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心理理论可以用于推断他人的信念、意图和知识,也可能服务于策略性欺骗或操控,并不必然包含情感卷入;本文所说的观点采择则更关注共情情境中个体如何理解他人的主观处境,尤其是在自我视角与他人视角不一致时,能否抑制自我中心解释,转而根据他人的立场理解其感受和反应。**Dvash 和 Shamay-Tsoory (2014)**指出,理解他人的想法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解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也不必然意味着产生共情或亲社会行为,这说明观点采择虽是共情的重要认知基础,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共情反应。

因此,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可以被视为共情中的两个核心但不同的成分。前者提供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直接感受和情绪卷入,后者提供对他人心理状态和处境的认知理解。二者不是简单的高低关系,也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系统,而是在真实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情感共情可以促使个体注意他人情绪和需要,观点采择则可以帮助个体解释这种需要并选择更合适的反应。由此,二者的区分不仅是概念层面的划分,也为进一步比较其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奠定基础。

2.3. 双成分结构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将共情区分为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并不是对共情概念的任意拆分,而是建立在理论模型、行为测量、临床病灶和神经影像研究的共同证据之上。从理论层面看,情感共情更接近对他人情绪或身体状态的共享性加工,观点采择则更接近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与推断。**Preston 和 de Waal (2002)**的知觉-行动模型为情感共情提供了基础机制,**Decety 和 Jackson (2006)**则进一步指出,成熟共情还需要观点采择、自我区分和情绪调节。由此,情感卷入与认知理解虽然共同服务于共情过程,但二者在加工方式上并不相同。

行为和量表研究也支持这种多维结构。**Davis (1983)**的 IRI 将共情相关反应区分为观点采择、幻想、共情关怀和个人痛苦等维度;**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 (2004)**在编制 EQ 时也指出,共情既包含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也包含由他人情绪引发相应情绪反应的能力。虽然现实情境中这两种成分经常交织在一起,但测量研究表明,它们不能被简单压缩为一个单一总分。

临床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分离证据。**Shamay-Tsoory 等(2009)**比较不同脑损伤患者后发现,下额回损伤主要影响情感共情,而腹内侧前额叶损伤主要影响认知共情,形成了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在行为表现和神经解剖上的双重分离。相关研究也显示,个体可能在一般信念推理上相对保留,却在

情绪性心理状态理解上受损(Shamay-Tsoory et al., 2007)。这些发现说明,共情中的情感共享、情绪性心理理解和认知性观点采择并非完全等同,而可能依赖部分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

神经影像元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点。Schurz 等(2021)对大量社会认知神经影像研究进行整合后提出,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任务可以大体分为偏认知、偏情感和混合加工三类。偏认知过程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和心智化,偏情感过程更多涉及观察他人情绪、动作或疼痛时的共享性表征,而复杂社会情境则往往同时调动二者。这一结果说明,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既具有可分离性,又并非完全独立。

因此,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可以被视为共情系统中的两个核心成分。二者的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研究中“共情”会表现出不同社会后果,也为进一步比较其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提供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双成分结构并不意味着真实共情可以被机械地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模块;相反,真实社会互动中的共情往往表现为情绪共享与观点采择的动态结合,只是在不同任务、情境和个体特征下,二者的相对作用有所不同。

2.4. 争议与备择模型

虽然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区分有助于澄清共情研究中的概念混用,并为比较二者的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提供了清晰框架,但双成分模型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主要问题在于,真实共情过程并不总是能够被简单划分为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许多社会情境中,个体既需要感知他人的情绪线索,也需要结合情境、关系和行为意图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双成分模型更适合作为分析框架,而不应被理解为两个彼此封闭、互不重叠的心理模块。

与双成分模型相比,具身模拟或知觉-行动模型更强调共情的自动化和身体化基础。Preston 和 de Waal (2002)认为,感知他人的情绪或身体状态会激活观察者自身相应表征,从而产生情绪感染、情绪共鸣或趋近反应。该模型能够较好解释情感共情、疼痛共情和情绪感染等现象,但对观点采择、情境推理、道德判断以及情绪调节等较复杂的共情过程解释相对有限。

社会神经科学的多成分模型则试图整合情绪共享、观点采择、自他区分和情绪调节等过程。Decety 和 Jackson (2006)指出,成熟共情不仅依赖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共享,还需要个体能够保持自他区分,并调节自身情绪唤醒,以避免共情反应转化为个人痛苦。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解释情感共情何以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亲社会反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导致情绪负担或回避倾向。

近年来的层级或多层次社会认知模型进一步强调,不同社会认知过程并非简单并列,而可能按照任务复杂性和加工层级形成连续结构。Schurz 等(2021)提出,社会认知任务可以大体区分为偏情感、偏认知和混合加工三类。偏情感任务更多涉及情绪和身体状态共享,偏认知任务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而自然化社会情境往往同时调动二者。该模型提示,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既具有可分离性,也常在复杂情境中共同作用。

由此可见,不同模型各有其解释重点。双成分模型的优势在于结构清晰,便于比较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在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上的差异;具身模拟模型更适合解释情绪共享和身体化反应;多成分模型和层级模型则更能呈现真实共情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复杂互动。本文采用双成分框架,并不是否认其他模型的解释价值,而是将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作为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分析维度,用以解释共情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为何可能产生不同社会后果。

3.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功能及神经机制

3.1. 情感共情的社会功能

情感共情的社会功能首先体现在个体对他人情绪线索的敏感性上。面孔表情、身体姿态、声音语调

和疼痛线索都是判断他人状态的重要信息。较高的情感共情倾向通常意味着个体更容易注意到这些线索,并产生较强的情绪和注意反应。**Choi 等(2014)**发现,高共情个体在加工多种情绪面孔时表现出更强的 N170 和 LPP 反应,说明共情特质与早期面孔加工和后期情绪注意分配有关。由此可见,情感共情不仅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也体现为对社会情绪信息的加工优先性。

情感共情还使个体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或困境形成即时情绪卷入。**Preston 和 de Waal (2002)**的知觉-行动模型认为,观察他人情绪或身体状态会激活观察者自身相关表征,从而促成情绪共鸣和趋近反应。这种机制有助于个体迅速觉察他人需要,并可能促进安慰、照料或帮助行为。**Hernández Peña 等(2024)**在暴力互动情境中也发现,个体在采纳受害者视角时表现出更高的情感共情卷入,说明情感共情并非只由刺激强度决定,也会受到对象身份和情境意义的调节。

但是,情感共情并不必然带来适应性结果。强烈的情绪共鸣可能促使个体回应他人痛苦,也可能导致自我导向的个人痛苦。**Batson 等(1997)**指出,想象自己处于他人困境中可能同时提高共情和自身不适。**Naor 等(2018)**也发现,疼痛共情会影响个体对他人情绪强度的判断,而认知重评能够减弱这种偏差。这说明情感共情虽能提高对他人情绪的敏感性,却未必总能提高情绪理解的准确性。

因此,情感共情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它为社会联结和亲社会反应提供情绪基础,但若缺乏自我区分和情绪调节,也可能转化为个人痛苦、判断偏差或回避倾向(**Decety & Jackson, 2006**)。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高共情”在不同研究中有时表现为助人倾向,有时却表现为情绪负担。

3.2. 情感共情的神经机制

情感共情的神经机制通常被置于“共享表征”框架下理解。该观点认为,个体在观察或想象他人的情绪、疼痛或身体状态时,会部分激活自身体验相似状态时所涉及的神经系统,从而形成对他人状态的情绪性理解。**Preston 和 de Waal (2002)**的知觉-行动模型为这一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续脑成像研究则进一步说明,情感共情包含身体化和情绪化加工,而不只是抽象推理。

疼痛共情是研究情感共情神经基础的经典范式。**Singer 等(2004)**比较个体亲身经历疼痛与得知亲密他人经历疼痛时的脑活动,发现两种条件均激活前岛叶、前扣带皮层、脑干和小脑等区域,而躯体感觉皮层等区域主要在亲身疼痛时激活。这表明,共情疼痛主要共享疼痛的情感-动机成分,而非完整复制其感觉-辨别成分。换言之,情感共情使个体体验到他人痛苦的情绪意义,但并不等同于在感觉层面经历他人的疼痛。

Bernhardt 和 Singer (2012)进一步指出,前岛叶和前扣带/中扣带皮层在疼痛共情、厌恶、社会痛苦和尴尬等多种情感共情任务中反复出现。前岛叶与内感受和主观情绪体验有关,扣带皮层则更多涉及情绪的动机意义和行动准备。此外,下额回、下顶叶和杏仁核等区域也参与情绪识别、情绪感染和显著性加工(**Shamay-Tsoory, 2011**)。这些发现说明,情感共情并非单一脑区的作用,而是情绪共享、身体状态表征和情境评价共同参与的网络过程。

不过,情感共情相关神经活动并非完全自动或固定。目标人物身份、群体关系、公平性评价和具体情境都会调节共情反应(**Bernhardt & Singer, 2012**)。**Schurz 等(2021)**的神经影像元分析也显示,偏情感的社会认知任务涉及岛叶、下额回、躯体感觉相关区域和中扣带皮层等网络。总体而言,情感共情的神经机制主要体现为情绪-身体状态共享和内感受加工,这为其快速反应性提供了基础,也解释了它为何容易受到情绪强度和情境评价的影响。

3.3. 观点采择的社会功能

与情感共情侧重情绪卷入不同,观点采择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与推断上。

在日常互动中,个体需要根据他人的信念、意图、愿望和处境解释其行为,并据此调整自身反应。观点采择使个体能够暂时摆脱自身立场,将他人的知识状态和主观经验纳入判断之中,因此是沟通、合作、冲突解决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基础。**Baron-Cohen 和 Wheelwright (2004)**指出,认知取向的共情涉及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以及对其行为的预测。

观点采择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在自我视角与他人视角发生冲突时抑制自我中心偏差。社会误解有时并非源于缺乏情绪反应,而是源于个体过度依赖自身知识和立场来解释他人行为。**Ferguson 等(2015)**使用错误信念语篇和 N400 指标发现,高共情个体更能依据人物的错误信念理解句义,而低共情个体更容易受到现实知识影响。这说明观点采择不仅是一种稳定倾向,也体现为即时情境理解中的视角转换能力。

观点采择还与道德判断和公平关切有关。**Decety 和 Yoder (2016)**发现,情绪性共情并不稳定预测个体对他人遭遇不公的敏感性,认知共情和共情关怀才更能预测他人导向的正义敏感性。这说明,仅仅被他人痛苦所唤起并不必然导致公正判断;个体还需要理解他人的处境、需要和受损利益,才能形成较稳定的他人导向评价。

不过,观点采择本身也不等同于亲社会动机。理解他人心理状态既可能促进沟通、合作和照顾,也可能被用于策略性操控或自利目的。**Dvash 和 Shamay-Tsoory (2014)**指出,理解他人的想法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解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也不必然意味着产生关怀或亲社会行为。因此,观点采择提供的是心理状态理解能力,而不是自动的道德动机。它只有与情感共情、共情关怀或道德规范相结合时,才更可能促进稳定的亲社会行为。

3.4. 观点采择的神经机制

观点采择的神经机制通常与心理理论或心智化网络密切相关。与情感共情依赖情绪-身体状态共享不同,观点采择更依赖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情境整合和自他区分。既有研究表明,内侧前额叶、颞顶联合区、后上颞沟、颞极、楔前叶和后扣带皮层等区域,是心理状态推断任务中较稳定出现的脑区。**Schurz 等(2021)**的神经影像元分析也指出,偏认知的社会认知任务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和心智化过程,与偏情感任务所依赖的情绪共享网络有所区别。

在这一网络中,内侧前额叶通常与对他人特质、意图和心理状态的整合性推断有关,颞顶联合区则被认为参与他人信念表征、自他区分和视角转换。**Dvash 和 Shamay-Tsoory (2014)**指出,认知性心理理论通常涉及内侧前额叶、上颞沟、颞极和颞顶联合区等区域,而情感性心理理论还会涉及腹内侧前额叶等与情绪和价值加工有关的区域。这说明,观点采择并不是单一脑区的功能,而是前额叶-颞顶系统在社会推理中的协同加工。

病灶研究为观点采择的神经基础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Shamay-Tsoory 等(2009)**发现,腹内侧前额叶损伤主要影响认知共情,而下额回损伤主要影响情感共情,形成行为和神经解剖上的双重分离。相关研究也显示,个体可能在认知性心理状态推断和情绪性心理状态推断上呈现不同损害模式(**Shamay-Tsoory et al., 2007**)。这些结果说明,观点采择不是情感共情的简单延伸,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神经基础。

从时间进程看,观点采择还涉及信念冲突、语义整合和情境更新等动态加工。**Ferguson 等(2015)**的 ERP 研究表明,当个体需要根据他人的错误信念理解事件时,N400 成分能够反映信念信息与语义加工之间的整合。**Boustani (2023)**也指出,P3b、晚期正成分和慢波活动可能与错误信念推理中的情境更新和元表征加工有关。总体而言,观点采择的神经机制可以概括为以前额叶-颞顶网络为基础的心理状态推断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表征他人立场、抑制自我中心解释,并根据情境更新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

3.5. 分离与整合

综上,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在社会功能和神经机制上具有相对清晰的差异。情感共情主要表现为对

他人情绪线索的敏感性、情绪卷入和即时反应，其神经基础更多涉及情绪共享、内感受加工和身体状态表征；观点采择则主要表现为对他人信念、意图、情绪原因和处境的理解，其神经基础更多涉及心理状态推断、自他区分和前额叶-颞顶网络。二者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共情”在不同研究中可能产生不同社会后果：情绪卷入可能促进照料，也可能导致个人痛苦；心理状态理解可能支持沟通和道德判断，却并不自动产生关怀。

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是两个互不相关的模块。真实社会互动往往比实验室中的单一任务更复杂，个体既需要感知他人的情绪反应，也需要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和情境意义。

Schurz 等(2021)提出的层级模型指出，除偏认知和偏情感过程外，还存在同时调动二者的混合过程。Hernández Peña 等(2024)在暴力互动情境中的研究也显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以及受害者/施害者视角会共同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和脑活动。这说明，当社会情境包含冲突、责任归因或道德评价时，情绪卷入和观点采择往往会交织在一起。

因此，对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二者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将共情固定为简单的二分结构，而是为了在复杂共情系统中识别两个最具解释力的功能维度。情感共情提供对他人的情绪状态的直接感受和社会联结基础，观点采择提供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和处境的认知理解；真实共情反应通常依赖二者的共同参与。由此，接下来的问题不再只是二者“有何不同”，而是它们如何在具体情境中相互作用，以及自他区分、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如何影响这种关系。

4. 关系整合与研究展望

4.1. 关系整合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构成共情系统中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分的两个核心维度。情感共情强调对他人的情绪或身体状态的共享性反应，观点采择强调从他人立场理解其信念、意图和处境。二者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共情社会后果的差异：同样被称为“共情”的反应，可能因情绪卷入、心理状态理解和调节能力的配置不同，而导向助人、公平判断、个人痛苦或判断偏差等不同结果。

然而，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系统。在真实社会互动中，个体既需要迅速注意到他人的情绪和需要，也需要理解这种情绪背后的原因、处境和可能需求。缺少情感共情，观点采择可能停留在较为冷静的心理推断层面；缺少观点采择，情感共情也可能转化为情绪感染、个人痛苦或判断偏差。因此，二者的关系更适合被理解为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动态协同，而不是简单的二分对立。

4.2. 应用启示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区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为临床、教育和司法等实践领域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框架。以自闭症谱系障碍为例，其社会互动困难不宜被简单概括为整体性的“共情不足”。双成分框架提示，相关困难可能分别涉及情绪线索识别、心理状态推断、观点采择、情绪表达或情绪调节等不同环节。Fletcher-Watson 和 Bird (2020)指出，自闭症与共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对应，需要结合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及具体社会互动情境加以理解。同时，“双重共情问题”也表明，社会理解困难并不一定只源于自闭症个体单方面的能力不足，也可能来自自闭症个体与非自闭症个体之间经验、表达方式和预期的不匹配(Milton, 2012)。因此，临床评估和干预不应只追求笼统的“提高共情”，而应根据个体在情绪共享、观点采择、自他区分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在教育领域，双成分框架提示，共情培养不应仅仅强调“感受他人痛苦”或增强情绪感染。单纯提高情绪敏感性可能带来更强的情绪卷入，却未必促进准确理解和有效回应。更适切的共情教育应同时包含情绪识别、观点采择和情绪调节训练，使个体既能觉察他人的情绪和需要，也能理解其处境，并在保

持自他区分的基础上作出合适回应。Goldstein 和 Winner (2012) 的研究表明, 基于角色扮演的训练能够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共情及心理理论能力发展, 这也说明观点采择相关能力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在司法领域,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平衡同样重要。涉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复杂情境中, 情感共情能够增强个体对受害者痛苦的敏感性, 但过度依赖情绪反应也可能导致判断偏向; 观点采择有助于理解行为意图、责任归因和情境因素, 但若缺乏情感关怀, 也可能停留在冷静的策略性推理层面。Decety 和 Cowell (2015) 指出, 共情、正义和道德行为之间并非单向对应, 不同共情成分可能对道德判断产生不同影响。由此可见, 在应用情境中, 双成分框架的价值不在于笼统地提高共情水平, 而在于根据具体情境区分情绪共享、心理理解和调节机制的不同作用。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首先, 共情相关概念的使用仍不够统一, 情感共情、共情关怀、个人痛苦、认知共情、观点采择和心理理论在不同研究中有时被交替使用, 导致结果难以直接比较。其次, 许多研究依赖自陈量表、面孔表情、疼痛图片或简短故事等材料, 虽然有助于控制变量, 但难以完全呈现真实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关系、情境意义和动态反馈。再次, 神经影像研究多为相关性证据, 虽然能够揭示相关脑区和网络, 但仍需要更多病灶研究、脑刺激研究和纵向研究来补充因果证据。此外, 现有样本多集中于成人、大学生或西方文化背景, 对不同年龄阶段、临床群体和文化情境下共情双成分关系的考察仍相对不足。

未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继续推进。第一, 应进一步明确概念与测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研究设计中清楚说明所考察的是情绪共享、观点采择、共情关怀还是个人痛苦, 并结合自陈量表、行为任务、生理指标和神经影像等多种方法, 以减少单一指标带来的解释偏差。第二, 应加强对真实社会情境中双成分协同机制的研究, 更多采用自然化视频、虚拟现实、互动任务和双人神经成像等方法, 考察个体在冲突、道德判断、照料、医疗和教育等情境中如何同时调动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第三, 应更加重视自他区分、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等调节机制, 探讨这些能力如何影响情感卷入与心理状态理解之间的关系, 以及是否可以通过训练提高个体形成适应性共情反应的能力。

总体而言, 情感共情与观点采择的区分并不是为了将共情机械地拆分为两个独立模块, 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共情作为多成分系统的作用机制。情感共情提供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直接感受和社会联结基础, 观点采择提供对他人心理状态和处境的认知理解; 二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相对作用及其协调方式, 决定了共情可能产生的具体社会后果。由此, 共情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一能力的强弱, 而应被理解为情绪共享、心理状态理解和调节机制在具体情境中的动态协调。

参考文献

- Baron-Cohen, S., & Wheelwright, S. (2004). The Empathy Quotient: An Investigation of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Normal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34, 163-175. <https://doi.org/10.1023/b:jadd.0000022607.19833.00>
- Batson, C. D., Early, S., & Salvarani, G. (1997). Perspective Taking: Imagining How Another Feels versus Imaging How You Would Fe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751-75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7237008>
- Bernhardt, B. C., & Singer, T. (2012). The Neural Basis of Empath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35, 1-2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neuro-062111-150536>
- Boustani, N. (2023). How Does the Brain Support Theory of Mind in Children? An EEG/ERP Review. *Journal of Cognition, Emotion & Education*, 1, 17-28. <https://doi.org/10.22034/cee.2023.171194>
- Choi, D., Nishimura, T., Motoi, M., Egashira, Y., Matsumoto, R., & Watanuki, S. (2014). Effect of Empathy Trait on Attention to Various Facial Expressions: Evidence from N170 and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Journal of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 33, Article No. 18. <https://doi.org/10.1186/1880-6805-33-18>

- Cuff, B. M. P., Brown, S. J., Taylor, L., & Howat, D. J. (2016). Empathy: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Emotion Review*, 8, 144-153. <https://doi.org/10.1177/1754073914558466>
-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13-12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4.1.113>
- Decety, J., & Cowell, J. M. (2015). Empathy, Justice, and Moral Behavior. *AJOB Neuroscience*, 6, 3-14. <https://doi.org/10.1080/21507740.2015.1047055>
- Decety, J., & Jackson, P. L. (2006). A Social-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54-58. <https://doi.org/10.1111/j.0963-7214.2006.00406.x>
- Decety, J., & Yoder, K. J. (2016). Empathy and Motivation for Justice: Cognitive Empathy and Concern, but Not Emotional Empathy, Predict Sensitivity to Injustice for Others. *Social Neuroscience*, 11, 1-14. <https://doi.org/10.1080/17470919.2015.1029593>
- Dvash, J., & Shamay-Tsoory, S. G. (2014). Theory of Mind and Empathy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Neurological Foundations.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34, 282-295. <https://doi.org/10.1097/tld.0000000000000040>
- Ferguson, H. J., Cane, J. E., Douchkov, M., & Wright, D. (2015). Empathy Predicts False Belief Reasoning 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N400.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 848-855. <https://doi.org/10.1093/scan/nsu131>
- Fletcher-Watson, S., & Bird, G. (2020). Autism and Empathy: What Are the Real Links? *Autism*, 24, 3-6.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19883506>
- Goldstein, T. R., & Winner, E. (2012). Enhancing Empathy and Theory of Mind.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3, 19-37. <https://doi.org/10.1080/15248372.2011.573514>
- Hernandez Pena, L., Weidacker, K., Massau, C., Wetzel, K., Brand, A., Weckes, K. et al. (2024). Can People Empathize with Offenders and Victims during Violent Scenes? Behavioral and Brain Correlates of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Considering Victim vs. Offender Perspective Using the Bochumer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Task (BACET). *Neuropsychologia*, 194, Article ID: 108784.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23.108784>
- Milton, D. E. M. (2012). 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Autism: The “Double Empathy Problem”. *Disability & Society*, 27, 883-887.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2.710008>
- Naor, N., Shamay-Tsoory, S. G., Sheppes, G., & Okon-Singer, H. (2018). The Impact of Empathy and Reappraisal on Emotional Intensity Recogni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32, 972-987.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7.1372366>
-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M. (2002). Empathy: Its Ultimate and Proximate Ba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5, 1-20.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2000018>
- Schurz, M., Radua, J., Tholen, M. G., Maliske, L., Margulies, D. S., Mars, R. B. et al. (2021). Toward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Social Cognition: A Neuroimaging Meta-Analysis and Integrative Review of Empathy and Theory of Min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7, 293-327.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303>
- Shamay-Tsoory, S. G. (2011). The Neural Bases for Empathy. *The Neuroscientist*, 17, 18-24. <https://doi.org/10.1177/1073858410379268>
- Shamay-Tsoory, S., Aharon-Peretz, J., & Levkovitz, Y. (2007). The Neuroanatomical Basis of Affective Mentalizing in Schizophrenia: Comparison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efrontal Lesions. *Schizophrenia Research*, 90, 274-283. <https://doi.org/10.1016/j.schres.2006.09.020>
- Shamay-Tsoory, S. G., Aharon-Peretz, J., & Perry, D. (2009). Two Systems for Empathy: A Double Di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mpathy in Inferior Frontal Gyrus versus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Lesions. *Brain*, 132, 617-627.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n279>
- Singer, T., Seymour, B., O'Doherty, J., Kaube, H., Dolan, R. J., & Frith, C. D. (2004). 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 *Science*, 303, 1157-116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93535>
- Titchener, E. B. (1909). *Lectures on 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f the Thought-Processes*.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37/10877-000>